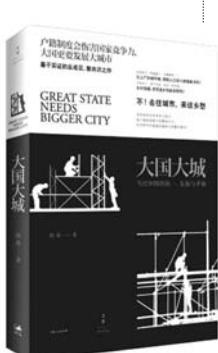




大家

陆铭：城市化之辩与大城之解（下）

本报记者 李师胜



城市病之解

齐鲁晚报:拥堵、污染、犯罪(3M)是国际上比较认可的三个“大城市病”,您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陆铭: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通常把拥堵、污染和犯罪当作三个主要的“城市病”,在中国则主要是拥堵和污染。

不过,当前中国城市里的这些问题,更多是管理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当前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供给不足。这与若干年前我们对于今天大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作出科学预测,是有关的。

总的来讲,为了应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挑战,要做到以下几

留守儿童之解

齐鲁晚报:在您的《大国大城》书封上有句话是“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从一位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乡愁更多的是私人品而不是公共品。怎么解释这一观点?

陆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里来居住、工作,这时带有乡愁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自己选择了城市生活,离开了农村,却希望政府通过政策干预来保留更多的农村、满足自己的乡愁,就有问题了。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很多反对城市化的声音,恰恰来自于城市居民,包括一些居住在城市的学者。这就违反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公正原则。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逐渐减少,农村逐渐消失,这是正常的

E 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

点。第一是科学规划,要认识到城市人口增长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学规律。第二,在人口不断流入的过程中,土地的供应要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第三,在供给方面要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数量、改善质量,优化布局,使得公共服务的总量、质量和空间布局能够满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需求增长。还有,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比如再生水;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城市的交通管理,这些是在技术层面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齐鲁晚报:城市的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量向大城市聚集,就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短缺。您认为,大城市的管理者应如何平衡公共服务和

人口流入之间的矛盾。

陆铭:一个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是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个体进行优化决策的结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只能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通过供给方的改革来提高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才是政策正确的方向。

至于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不是有限,我认为,首先,不是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是我们在通过某一些错误的政策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比如说提高了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第二,如果政府解放思想,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进城安居乐业,那么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应。当然,客观上来讲,这种增加速度不可能很快。那么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也应该

往着降低门槛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政府,即外来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比如说,当下全国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本地常住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平均达到30%,在北京和上海该比例达到40%。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设定一个简单的政策目标,不是说要在一夜之间把户籍制度完全取消,但能否逐渐降低外来人口在本地常住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市民化的比重。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让京沪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我们真心诚意地用三十年到四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比重逐渐降到零。其实这点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更快。

房价之解

齐鲁晚报:提到一二线城市,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房价问题。许多人坚信“京沪永远涨”,为买房打气,也有人以东京为例说迟早要跌。您怎么看待房价问题的走向?

陆铭:房价和其他商品一样,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就是供给和需求。需求最重要的是两个变量,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另外一个是人口的增量。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基本因素。但在中国讨论房价,常常忽略了关于供给的因素。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人口越发向沿海地区,特别是向沿海大城市集中,土地供应却被政府的政策限制住了。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在收入持续增长、人口持续流入的地区收紧土地供应,就会导致住房的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这时,房价就会快速上

G 大城市房价猛涨挤压了消费空间

涨。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大城市,收入也在持续增长,人口也在持续流入,但却没有出现快速的房价上涨。因为在中西部大城市,并没有出现土地供应的严格限制。

中国的一线城市,如果可以增加土地供应,并且把土地供应中用来建造房子的比率逐渐提高,把既有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转化为住宅用地,对于城市住房的容积率不要过度严格管制,那么,这几方面供给的增加,就可以极大缓解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如果因为这样的因素而导致房价稳定,甚至小幅下跌,对整个市场是有益的,居民福利水平也是提高的。

中国的房价问题,不同于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房价从泡沫到破灭的历史。换句话来说,讨论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问题,不应该仅从房价变化的趋势本身去着手,简

单地以日本经验来预测房价未来会跌,而应该从分析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根本因素,找到问题的症结。

齐鲁晚报:房价总是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相关的。眼下在大城市中有一个热门话题“消费降级”,您如何看待这一经济现象?

陆铭:房价和未来收入预期相关,消费其实也和未来收入预期相关。中国经济当前出现的问题,其实更多应该从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方面去寻找问题。这也是近些年我们一直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我更强调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错配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十多年来,政府所引导的资源一直在配置到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地方,而在大城市,对创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却重

视不足。而限制大城市发展又过度依赖于土地供应的控制,导致了房价的快速上涨。

房价的快速上涨,又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的空间,同时不少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有的比较悲观,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得我们担心消费可能出现降级。目前消费是否真的出现降级有待研究,但消费增长的速度本身不够快却是一个事实。

根本的解决方案还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把经济资源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引导到回报率比较高的地区,让整个经济适应城市化的浪潮以及人口在空间上向大城市集中的世界普遍规律。这样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可持续的要求,也能够产生经济发展的动力,缓解对收入增长速度放缓的担忧,重新启动消费,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

户籍之解

H 户籍门槛限制了举家迁移

有本地户籍,在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廉租房公租房等方面是有差别待遇的。这就意味着,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讲,往往是把年轻男性派到收入更高的地方,而在老家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迁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的举家迁移率非常低。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人口流出地如果要解决问题,恐怕也不只是自己本地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要通过制度变革来促进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同时,欠发达地区更要找准自己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如果阻碍劳动力流动,如果地

区大干快上发展一些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最后所导致的结果,就像现在看到的那样,在很多城市建立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工业园和新城。地方政府债务投入到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却没有回报。同时,在全国层面也形成了投资回报率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

齐鲁晚报:在城市发展,政府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陆铭: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三组关系,那就是效率和平等的关系,集聚和平等平衡的关系,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在人口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下,人们会向收入更高的地方迁移,一直迁移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均等化为止。这就是在其他国家,城乡间差距和地区差距远远低于中国的原因所在。

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市场应该成为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决定性力量,应该允许包括人、钱、土地等各种各样的经济资源去追求它们回报最大化的用途。与此同时,政府的公共政策,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去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质量,注重公平性。但是要防止政府投资到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去,最后导致得不偿失的局面。